

李石岑

李石岑 著

本书收录著名学者李石岑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应各学校、团体之邀所作的十五篇讲演，涉及怀疑与信仰、哲学与人生、佛学与人生、教育与人生等哲学与生命论题，既介绍西方学说，又参以中国传统经验，从中可见作者对东西文化会通之努力。本书既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，又对读者思考人生、社会诸多问题颇具参考价值。

讲演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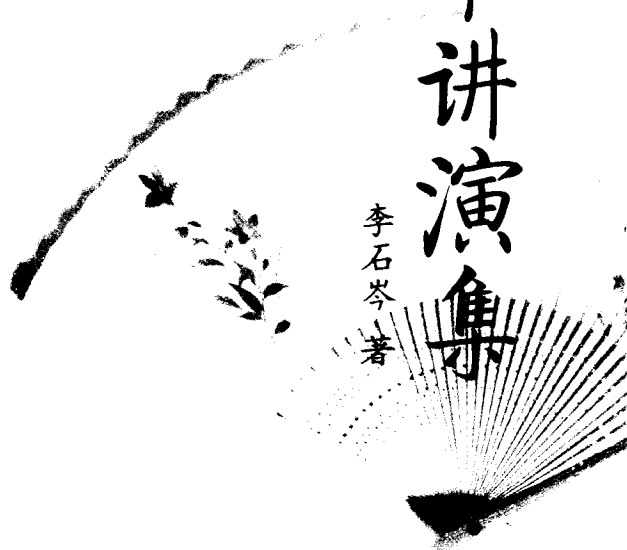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李石岑讲演集

李石岑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石岑讲演集/李石岑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4. 12

ISBN 7-5633-5061-6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21498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)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89mm×1 240mm 1/24

印张:6.5 字数:113.8千字

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7.00元

如果发现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 代序

稚晖^①先生：我与先生相识，是在民国九年同到湖南讲演的那一遭。一见面，便知先生是个有特识的人；后来相处稍久，并知先生是个有独行的人。那时我心目中有两个人认为是我国青年的模范：一个是先生，一个是蔡子民先生。先生的不坐轿，不乘人力车，不赴宴会，和子民先生的不喝酒，不吃烟，不事征逐，犹属余事；而先生一团勇猛的精神，和子民先生一副诚恳的面目，直无时不可以激发青年的内心，实在令我不能不生十二分的敬仰！先生最近拿着乡下老头儿靠在柴积上晒日黄说闲空的态度，发挥了“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”的一篇大文章，我读了固属佩服先生的卓识，尤其佩服先生那种童稚未凿的天真和精进不懈的努力。

先生虽不以学问家自居，却是个极留心学问的人；并且先生的那种留心学问，是无所为而为的。我友梁漱溟先生亦复和先生同样地留心学问，但他是为着生活不安而往前寻求的，他的学问和他的生活是处处有个较量的；这层先生也曾经说过。他这种态度自然不由得我们不特加敬礼；但为生活而学问，究竟学问能不能使我们生活安全，却还是一个问題。不过由愚见看来，学问固多少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，但我们豫先立定一个主意，必求生活解决于学问，不特势有所不能，抑且理有所不可。因为生活是主观的，学问是客观的；生活是偏于意志的，学问是偏于知识的；欲求主观解决于客观，意志听命于

^① 指吴稚晖（1865—1953），江苏武进人，原名眺，后名敬恒，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。

知识,又焉可能?但学问虽不能全部地解决生活,却很可以局部地整理生活,或使生活渐进于丰富。漱溟先生如果必欲由学问全部地解决生活,那我却不敢保证他能够解决了;所以有少数人推测他或者将来要重行回到佛家的路子,或者竟蹈他尊翁的覆辙以至于自杀。(这种推测,先生也向我表示过。)如果仅欲由学问局部地整理生活,或使生活渐进于丰富,那是漱溟先生不仅资格独备,而且已经得了不少的后继者;因为他对于生活异常认真,他的生活能够跟着他的思想见解走,所以他的朋友因此也多受他的感化。总之,漱溟先生的为生活而学问,虽与先生无所为而为的有别,却比那些为功利而学问的高出一筹。为功利而学问,可说是一般人的普通现象,尤其是在我国目下的学术界。这种现象的流弊,足以暗示青年热衷功利,把学问当作一块敲门砖;功利到手,学问便可不要;设使又有一种功利可以企图,那时学问之念又起;结果,学问完全做了功利的一种手段。这在功利本身,虽说得计;但就学问说,可就吃亏不少了。至少我以为有下列的几个弊端:一,热衷功利的人,他必定另有一个目标;他所费的努力,必顺着目标求取得一点代价,而且要快快地取得;因此学问就不免要受一种大大的委屈,而冒牌的出品,也就藉此获得一些销路。二,这种出品,有时销路转畅,其结果足以阻碍真货的输出,而顾客的受害益深。三,这种人多贩卖零货,他虽成本不大,却各样货色都有,顾客为贪图便宜,也乐与交易,其结果使各种大企业无人去干。这几项情形,在我国现前学术界,实在不能为讳。学问遇着这种厄运,怎能有进步可望?但这是就极浅薄的功利派而言;严格地说,还配不上功利。真正为功利而学问的人,他的主眼别有所在,他背后必有一种确定的主义。所谓功利,大抵是就最大多数说;无论为一小团体或一大团体,现在或未来,都包括最大多数而言。为功利而学问,无异说为最大多数的功利而学问,想借学问来解决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。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,究竟能由学问解决与否,姑且不论;但学问本身已因谋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之故,不能不多少由一种本然性而趋于一种可动性。因为甲团体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,不必同于乙团体;现在最大多数的幸福与安宁又不必同于未来;那么,学问在甲团体认为正确的,不能保证在乙团体亦认为正确;在现在认为正确的,不能保证在未来亦认为正确;则学问虽以普遍妥当

为其特质,到此亦不免失其根据。我们既已提到学问,当然以求正确或求正确之最大限度为鹄;而彼为功利而学问的人,不仅未暇及此,而且常被发现一个不易弥补的缺憾,就是他们好以部分概全体,以效用概实质。所以他们的发意虽可嘉许,但结果对于学问上的贡献却是很少。由此推论,以学问为出发点,而批评治学态度之是非得失,当然不归到为学问而学问一条路上去。因为为学问而学问,其主旨只在学问的阐明,而它非所问。所以,学问的效果如何,或是一时得不到效果,或竟永远得不到效果,在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看来,都是不足挂意的。他们把学问看作进化的路程中人类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发现,所以用不着功利的辩护。他们对于学问的看法,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的看法,恰好相反。为功利而学问的人大抵看重现前的实用,以为学问的价值就可由它实用的范围广狭而定:数学能够计算,能够测量,所以数学是有价值的学问;电学能够造电车、电信,所以电学是有价值的学问。但在为学问而学问的人,观点便完全不同;他们把学问和学问的实用看作一件东西的两面。他们只探求学问的究竟;换句话说,他们只探求真理的究竟。他们不为计算测量而研究数学,如果能探求得数学的究竟,即非欧几里几何学或虚数等,亦不能稍减他研究的兴味;他们不为电车电信而研究电学,如果能探求得电学的究竟,即电子的构造或以太的实性等,亦不能稍挫他探求的勇气。因为数学的价值正不必表现于计算测量,电学的价值正不必表现于电车电信;它们的价值,永在探求的途中,愈探求而价值愈显著,一面发挥自身之实际的价值,一面组成自身之理论的体系。牛顿看见苹果落下而想到地球的引力,但他绝没预想到今日物理学上的应用;爱因斯坦(Einstein)怀疑牛顿之引力法则而想到质点的引力可使空间和时间生歪斜(Distortion),但他绝没预想到未来以太学上的应用;法雷德(Faraday,现一般译为法拉第——编者注)在一八二五年发见石油精(Benzin),九年后密杰尔立希(Mitscherlich)发见从石油精酸的采取法,这两个著名的化学者当从事发见之时,并没预想到这种无色可燃性的液体,将来可以号召几百万的职工;一八五三年汤姆逊(Thomson,现一般译为汤姆生——编者注)在《哲学杂志》上发表一篇《电波振动的理论》,也绝没预想到这篇文章里面就立了现在各种无线电信的基础。总之,他们只管组成学问自身之理论的体系,

而学问之实际的价值,却绝不因他们没预想到而不呈现。因为他们的背后正有不少的发明者。发明者与发见者的事业虽有不同,而他们的价值高低,却未易强生区别;发明界的伟人安迪逊(Edison,现一般译为爱迪生——编者注),正不必比相对性原理发见者爱因斯坦价值增高。由此可知学问的究竟之探求,自别具有一种价值;不存求些许价值的念头,而获得绝大价值的结果,这便是为学问而学问所得的报酬。为学问而学问的人,既不存价值的念头,所以虽由学问发生一些良效果,他也不愿居功;反转来说,如果由学问而发生一些恶效果,他当然也不愿居罪。飞行机虽是成了战时空中的利器,但这不能怪到想出纸鸢的原理的阿尔基达士(Archytas);潜航艇虽是成了战时水中的利器,但这不能怪到想出比重的原理的阿尔基麦德士(Archimedes,现一般译为阿基米德——编者注);毒瓦斯虽负有战时一霎间杀害千百万生命的凶威,但这不能怪到发见瓦斯的穆尔脱克(Murdoch);德意志敢与列强反目,酿成欧洲的空前大战,但这不能怪到倡权力意志的尼采(Nietzsche)。可见学问和学问的实用,绝对不能并为一谈。所以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对于学问的看法,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的看法,恰成一个对向。合上述三者而论,无论其为生活而学问,为功利而学问,或为学问而学问,都各有其立脚点,即各有以表明其治学的态度。但治学的态度之不同,骨子里就由于做人的态度之不同;所以为生活而学问的不得不有为生活而学问的一种生活,为功利而学问的不得不有为功利而学问的一种生活,为学问而学问的不得不有为学问而学问的一种生活。这几种生活,哪种合理,那种不合理,这是不能由个人的见地批评的。由愚见看来,无论哪种生活,都各有其生活上的特征,并且各种生活都是互相调剂,不可缺少的,尤其是应该产生多种样式的生活,那生活才能日进于丰富。生活和人生,本一而二,二而一;由人生态度可以看出生活态度,由生活态度,也就可以看出人生态度;由人生态度之不能统一,就可以想见生活态度之不能统一。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,是想处处由学问使生活得着安全。凡一举手一投足,一饮一食,一哭一笑,都要叫它得着安慰。凡物质上的不满足,精神上的不愉快,都要叫它转变方向,使结果仍可以得着一个满足,得着一种愉快。我们只要顺着生命的本来方向做去,便可以无入而不自得,便举手也好,投足也好,饮也好,食也好,

哭也好,笑也好;因为要笑的时候不笑,要哭的时候不哭,便是逆着生命的方向而行,而这副要哭要笑的情感便不能发抒。所以情感催发我们笑时,只管尽量地笑出来;情感催发我们哭时,只管尽量地哭出来;哭的时候,看似痛苦;实则要哭时不哭,哭时而不能畅快地哭,乃真痛苦。饮食也是如此。饮食只须顺着生命的要求便可隐消百病;凡过量饮食或饮食不足,都是有逆于生命的本来方向。其他一举手一投足,无不如此。物质上感着不满足,精神上感着不愉快,都缘于不向生命中去找寻而求取于外;一向外取求,便萌贪念;既萌贪念,则一切社会上的纷乱,便都从此始。梁漱溟先生的人生态度,恐怕是这样。因为他留神考察个人生活不安的所在与夫近代人生活的堕落,所以想提出孔家哲学来作一时的救济。这是他为生活而学问的一种生活。他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上,几几乎全部都是描写他这种生活态度的。我友朱谦之先生,也多少和这种态度相似,所以从前为怀疑一切而著《虚无哲学》,现在却转向信仰,而发表他的《周易哲学》了。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,是想处处由学问使最大多数得着幸福与安宁。最大多数是他的一个大我,他自己不过是大我中的小我;小我的一切是非善恶无不影响于大我,大我的一切盛衰荣辱亦无不影响于小我;但小我是死亡的,大我是永存的;大我是有人格的,小我是附着大我才发生人格的;因此,我们不能不勉为大我中的一个善良因子。这种人无论对于科学和艺术,都是用这个见地去评价。托尔斯泰像是抱这个见地的人,他在《人生论》上,就处处发表他这种态度。他拿磨坊里面的水车作比喻,说水车的目的在产出良粉,人生的目的在探求人类的运命和幸福;如果忘却这一点,那便任何学问都无用处。但现代所谓科学家,每每把水车的目的忘却,专门去研究那水流的方向,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吗?因此,他的艺术观和科学观,都开辟一个新局面。他最初骂倒一切伪艺术伪科学,因而自己下了真艺术真科学的一个定义,他说:“人们如果要想到什么是他们的运命和幸福,那么,科学便是这种运命和幸福的教师,艺术乃是这种教训的表白。苏罗们(Solomon,现一般译为所罗门——编者注)和孔子的法则是科学,摩西(Moses)和基督的教训是科学,雅典的宫殿,大维德(David,现一般译为大卫——编者注)的诗篇和教会的礼拜是艺术。”他最后举出真艺术真科学应具有两种特质:一、从事科学和艺术的

人,是不在为自己的利益,而在由牺牲自己去实现那科学和艺术的使命,这是内的特质;二、凡一切制作,要使一切人能理解,这是外的特质。由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和科学观与夫他所举的两种特质,便完全知道他是哪种人生态度,便完全知道他是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;因此,他的生活态度,也另具一种色彩。他的最浓厚的色彩,像无抵抗主义的生活态度,何尝不是由他那种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而来。最后论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。这种人生是完全以探求自然界的真理为依归的。真理究竟有无其物,真理是否可以进化,他都不问,他只是向前面去探求。他认为在进化路程中人类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发现者,必可以多少找寻着几许痕迹。这一点一点的痕迹,虽不因我们不找寻而不存在;但不找寻的结果,也许误认到别种痕迹;因为别种痕迹又有别种痕迹的来路,别种痕迹的找寻又要另作一次的探险。然他虽出于找寻,却等于不找寻。因为他不是本来没有的再向别的地方去找寻;他是本来就有的,只是不知安放何所,而出于找寻;并且他所以找寻不是为自己的利益,也不是为他人的利益,结果并无利益可说,只不过把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揭出而已。所以他的科学观和艺术观,另是一副样式,出于“知自然”的态度者为科学,出于“乐自然”的态度者为艺术。他既只和自然相接近,他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一分子,所以他的趣味和享乐,不必向社会去找寻,也就可以免去一切实生活上的烦闷。王尔德(Wilde)为一极端的唯美主义者;他认唯美的享乐为人生最高的目的;美的价值,丝毫不含功利的分子;价值愈高,则其排功利的色彩亦愈浓。王尔德欲宣传他这种唯美主义,曾于一八八一年独往美洲,力斥美国人的生活为非美术的;虽遭失败,而他的唯美主张仍不稍懈;其后又不幸触某侯爵之忌而至于入狱,但他的唯美思想仍坚持到底。可知他这种生活态度,完全由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而来。此外像苏格拉底为逢人便盘问人生真义而被判处死刑,哥白尼为说明天体运行而见嫉于教会,加里略(Galileo,现一般译为伽利略——编者注)之死于地动说,布尔诺(Bruno,现一般译为布鲁诺——编者注)之死于泛神论,何莫非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。由是可知一个人的生活态度,处处根据于他的人生态度;人生态度未能统一,生活态度当然也不能统一;所以批评哪种生活合理,那种生活不合理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不过由上

面三个人生态度看来,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,似乎仍脱不了功利的色彩;因为他虽是注重在生活,但仍集中于人事,结果似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无大区别。关于这点,我往时在《艺术论》上曾经讨论过,我以为功利有二义:前者为第一义的功利,后者为第二义的功利。第二义的功利,专着眼在社会的善,是一种外的生活;像美学上的美善同体说,譬如说操练为舞蹈的目的,标识为雕刻的目的,乃至劝善惩恶为诗歌的目的,都是这一派的主张。若第一义的功利便不然,他的主眼全在表现生命的根本活力,找出生命的本来方向,是一种内的生活;像美学上的游戏说,谓人类生活力有剩余时即溢而为游戏,这种游戏和美根本相通,所以说美为生的剩余。但第一义的功利,若稍不加意,即堕而为宗教问题的托尔斯泰,社会问题的左拉(Zola),道德问题的易卜生(Ibsen);所以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,最容易误会到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。但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,却也有和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相交通之处。因为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,主眼在表现生命的根本活力,找出生命的本来方向;而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,也正为此。不过他的精神扩大些,他不仅想表现人类生命的根本活力,不仅想找出人类生命的本来方向,他直有“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,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”的气概,所以他的人生态度,又另是一番气象。于是我们由这种推论的结果,可以划出几种生活而得次表;

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——求个人的真——个人生活

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——求社会的善——社会生活

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——求宇宙的美——宇宙生活

为生活而学问的人,有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色彩,因为他着手在个人,而着眼却在人类全体;为功利而学问的人,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色彩,因为他着手无论在国家在社会,但着眼总在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,为学问而学问的人,有个人主义和艺术的精神,因为他着手虽出于个人的兴趣,着眼却在艺术的全体。法国人的风度似看重为生活而学问,英美两国人的风度,似看重为功利而学问,德国人的风度似看重为学问而学问。然风度虽有这种差别,却是根据于个人的好尚者其力弱,根据于社会上历史上的暗

示者其力强；所以当前次欧洲大战争最剧烈的时候，各国爱真理的哲学者文学者乃至科学者，莫不为己国辩护，而集矢于他国；如哈普特曼（Hauptmann，现一般译为霍普特曼——编者注），倭伊铿，赫克尔（现一般译为黑格尔——编者注），柏格森，梅特林克，坦努爵（D'Annunzio，现一般译为邓南遮——编者注）一流人，莫不由崇高的讲座上的哲学者，寂静的书斋里的文学者，丰富的试验室里的科学者一变而为街头的政论家，社会的批评家，国家的志士；都把他们所怀抱的真理一切忘却。罗素看了这种情形，气愤不过，于是在1915年发表他《战时的正义》一种论文，痛论当时各国的哲学者文学者乃至科学者的态度的不对，以为我们看到己国的是，也宜看到敌国的是，我们攻击敌国的非，也当攻击己国的非，因在论文中把战争的毒害和文明的危机细加论列。他因为提出这种论文而弃了大学的教授，后来竟因此触了英政府的忌讳而受了一年的狱中生活。我们到此时可以想到为学问而学问的生活态度之难能而可贵。但为学问而学问，有时他的背景不像为生活而学问或为功利而学问的那样显明。因为为生活而学问的人和为功利而学问的人，多半是肯定这个世间，肯定这个人生；因为生活不得解决，便想进一步求生活的解决；因为功利不能普及，便想进一步求功利的普及；所以这两种人多半是出于乐天观。但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的背景便不是这样显明，因为厌世乐天，都伏有一种“价值”的观念；这种人既一任自然的流行，更安用人间苦乐的较量？即在为生活而学问或为功利而学问的人，亦有不存这种较量的，不过不像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之根本的不存较量的念头而已。我友顾颉刚先生，可谓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，他丝毫不存这种较量的念头，他以为你存这种念头，结果横直你也不能解决。不过这里面有一种界域，就是因不能解决而勉强出于学问者，这种人的背后仍是一种厌世观，因为他是把学问当作一种消遣品，和搓麻雀打乒乓一样的意味，就是近人某君所谓把学问当作一种麻醉脑筋的方法，但这不能算是为学问而学问。为学问而学问的人，完全出于一种积极的态度，意在揭出学问的真面目，其对于世间，便想找出一个真是非；即讲到应用，也要求出一个真价值。譬如研究化学，不像功利派的主张，只要注意到日常的应用，如肥皂怎样造法，为什么可以去衣服上面的污，（杜威《教育哲学讲演稿》第一三七页就有这一类的议论），他

是要进一步,研究到造肥皂以外的重大问题,而那些重大问题对于应用上比去衣服上面的污更有价值;就讲到肥皂,他也要专对着肥皂下一种精深的研究。譬如肥皂的原料、制法、功用、种类等,在普通一点的,固不消说;即专门一点的,也当用全力去探求,无论为胶状肥皂,透明肥皂,药用肥皂,过酸化肥皂,练绢用肥皂,粉肥皂,海水用肥皂,松脂肥皂,斑纹肥皂,浮肥皂乃至整容用肥皂,我们都一样的要考求它的制法和用途。甚至肥皂的历史,也要加一番的考求,以求知它进步的程式。譬如用肥皂去污,我们都知道;但罗马时代的洗濯店,却用尿去污。因为肥皂去污,靠曹达的作用;但尿腐败之后所发出来的亚姆尼亚,也是曹达之一种,也一样的可以去污。此外像肥皂制造的第一个恩人史孚勒(Chevreul),第二个恩人鲁布兰(Leblanc),也都值得我们记忆。总之,我们不仅注意到肥皂怎样造法,并注意到怎样的精造法;不仅求去衣服上面的污,并要使衣服的颜色加倍妍丽:这是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的态度。我以为这种态度,值得提倡,因为在我们极贫枯的中国里面,无论农工商医以至百业,都没有一种精深的学问做基础;无论谈什么主义,作何种运动,都是一些极脆弱的根据;无论解决何项困难问题,也很少可作学问上例证的价值。因为大家都不肯死劲读书,各人的造就也都可以料定几分,乐得我骗你你骗我。像这样迁延下去,要想依附他人,加入文化的行伍,直是梦想!纵或有一二知道学问很重要的,也就不肯发大愿心,把学问当作一种终身的事业;又纵或有一二聪明绝顶的天才,也就不愿意抛弃物质上的享乐,终于事业将要告成而又全毁。孔子有言:知之不如好之,好之不如乐之;他们虽知之而始终不好,更哪有乐此不疲的精神!所以我以为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态度,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。还有一层,我国目下宜急于提倡科学,这是无论何人,莫不认为天经地义的;但提到科学,便要知道研究科学是一种极静寂的生活,是一种极淡泊的生活。我此刻回想到我从前研究微分方程式、研究圆锥曲线的生活,直要使我登时合十冥想,不愿把心放开,不愿把生活扩大,不愿作一切无谓的应酬,不愿浪费一点宝贵的光阴;因为不把精神引到极静寂极淡泊的境地,则高深的学理便不易玩索有得;何况分心于物质上的享乐,又安望研究之能有成?所以真正想提倡科学,非大家把精神镇定不可,非大家倾向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生活态度不可。至于

为功利而学问和为生活而学问的生活态度,非必不可以提倡,不过在龌龊纷乱的中国里面,恐怕一提到功利,便要发生许多恶影响,而直接受害的,就是这无数的纯洁的青年;又为生活而学问的态度,虽是注重在身心的修养,却恐流于宋明道学一类的玄谈,结果仍易发生不少的流弊。所以我认为还是倡导为学问而学问的生活态度,比较地适合我国现时的情状;并且可矫正一般不好学的惯习,更借以应接世界学术的潮流。凡以上种种妄谈,不知先生认为有当否?日前谬承以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相许,实则我哪配谈学问?严格说,在我们知识界闹饥荒的中国,果又有谁配谈学问?牛顿临死时,说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恒河沙数之一粒;可怜我们现在的中国人,果有谁能知道牛顿的哪一粒?所以谈到学问,不特我要羞死,恐怕全中国人也要羞死。不过我这篇妄谈,却是为先生这一句话引起来的;或者将来向学问这条路上走去,也因先生这句话增加我不少的勇气。现在我要将我关于这方面的生活态度,向先生陈说,求先生加一个订正。我自从五岁受书一直到现在三十三岁,没有离开书本生活,中间虽是经了许多良师益友的指导,却是不能叫我开辟一个方向,可以照这个方向一直走去,结果只在路当中回旋。直到二十五岁以后,才慢慢地知道划出一个轮廓,对于自己的生活便不肯放松。后来得了个绝大的暗示,(也许我现在的的生活还是受了这个暗示的结果,)就是尼采的思想。我觉得他的思想和我很合脾胃,我的生活就从此着了一个很浓厚的色彩。自后无论读书治事,处人接物,总脱不了这种见解;就是对着路上一个乞丐,也不肯抛弃这种见解去对付他。(因为尼采不主张怜悯,说怜悯适以减杀他人的能力,而成全他一种惰性。)这是我生活的一般。至论到学问,虽然我近来稍稍知道去用心思,但从不敢轻易对旁人加一点批评,觉得什么人所说的话都对,什么人所发的议论都有存在的价值,也难怪先生说我很能包容。不过我自己却是有个主见,我就是要妄评他人的得失,也只不过拿我这种主见去作一个仲裁,但决不敢否认任何方面的见解。因为任何方面的见解,都有它的来路。我是最看重艺术的,我觉得宇宙间是个大艺术品的贮藏所。但艺术的本质为生命表现;讲到生命表现,不一定要论到哪种作品,就是英雄的征服欲,学者的智识欲,小孩子的游戏冲动,诗人的感情激昂,也都不外是一种生命的表现。生命的来源既有这许多,我们决不

能对这种是认,对那种否认。就论到科学,无论哪种科学,都是人类精神之必然的发现;如果努力研究下去,都可以获得一些成绩;这就是生命表现的结果。科学和艺术,原有互相交通的地方,因为都带有生命表现的使命;由生命表现而出于知的方法者为科学;由生命表现而出于直观的方法者为艺术。科学的根底既与艺术的根底相一致。所以科学家有时也自命为一种艺术家;因为,一、科学的研究,正如绘画一样,乃是想达到事物的背景及意义的一种努力;二、科学的研究中,有一种努力随之而起,这种努力便是努力自身的报酬;三、科学之最高级即公式、系统、对当关系、相互关系等之发见,都有几分是个人的功业。我因为科学家和艺术家有这么一个相交通之点,所以对于任何方面的见解,觉得都有尊重的价值。不过我最重一种见解,贯彻到底;如果是骑墙式的裁判,灰色的调和,客气的交游,矛盾的生活,那都是我所最痛心的。我生平最主张“偏”,但“偏”要一偏到底,我最恨庸庸碌碌的“中”。中庸的“中”与庸碌的“中”是绝不相同的,能将“中”字的功夫做到底,这个“中”也是偏的“中”。就讲到学问,也都是各人发挥各人的“偏”;譬如讲唯识,就偏在识,讲唯心就偏在心,讲唯物就偏在物,讲唯名就偏在名,哪一种学问不是发挥哪种偏的精神。更讲到做人,也靠这个偏字作一个人的骨干,偏就是教育学上所谓个性。各人因遗传环境教育等的不同,而成功各人的个性;我们发挥这种个性,就成功一种人格;如果侵犯我的个性,就无异侵犯我的人格;换句话说,如果损伤我“偏”的精神,就无异损伤我的人格。我唯其把“偏”字看得非常重要,所以对于人家的见解,不敢不特加尊重。我又因为“偏”另有一种偏的功夫,所以主张“大意力”的磨炼。大意力便是意志里面所含的一种潜在的性能,非经强度的磨炼,即不易发现。如果要问什么是磨炼的方法,唯一的条件就在欢迎苦痛。我们由苦痛可以锻炼一做不平凡的生活。如果遇着苦痛而让步,那是一种极大的耻辱。要由这样很靠实很笨拙的方法,那大意力才能发现,偏的功夫须做到这一步。我虽未能做到,却是时时刻刻牢记着,并且愿意把这段功夫告诉给别人。我由这种“偏”的意味尊重人家的见解,也由这种偏的意味尊重各种学术。我觉得无论哪种学术,都值得精求。我所以对于各种学术很觉得有兴趣,也大半为此。倍根说:“世间的快乐都易惹起一种饱和的状态,就是一到了快乐的境

地,那种快乐便老早去了。但是学问便不然。学问绝不会惹起饱和的状态,学问是由满足和欲求永远互相交代而起的東西,它对于享乐它的人,它便更贡献一种享乐做他的报酬。”我近来颇感到这句话的可信而愿意去尝试,但绝非出于厌世,也没有为什么而学问的一种成心;结果恐怕要归到尼采所说的一种权力意志的表现。我上面已经妄谈到为生活为功利和为学问而学问的各种生活态度,但不知先生那种靠在柴积上晒日黄说闲空的态度,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?在我的浅测,以为先生这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态度。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态度,当然另有一种境界;不知先生能够再用一种说闲空的态度替在下说说么?我因为先生的那种蔼然可亲,不能自禁地诉说了一大篇,所有一些观察不正确的地方,千万望先生赐教!

李石岑,民国十三年元旦

吴稚晖序

石岑先生：我未识先生以前，已在此处彼处，读了先生许多论，年来更看见了不少的大作，终是树义极坚卓，却平允不肯没人一毫之善，所以钦服先生为真理求真理，知先生为学，亦为学问求学问。这种为学态度，似乎我们东方人向来欠缺。想起来，英美学者亦少此风。因此，从前李石曾先生每欲以法人为学的态度，介绍于国人。现在先生说，他尚带些生活色彩，不若德人对学问是学问，尤其看得认真；拿先生的话，从战后观察，德人已把从前被军阀罩着的一层黑幕揭了去，显出他赤裸裸的真相，才证明先生所说的万确。宜乎他的成就，自然比世界为高。就用功利的意见去批评，前年我同褚民谊先生同车赴德，虽号称战后荒残境界，固与十年前所见大异，然一草一木，还都表显了学问整理的精神。褚君与我不约而同地相视慨叹。戏相谓曰，叫英法美战胜了德国，无异助纣三推仆了流氓。褚君并说，人类智识程度如此，为之奈何。我曰，推仆定不可少。别为一义。军国主义的完全告终，幸有此一仆。且异日真共产主义实现，必为今日失败的马格斯之乡亲。倘欲再进而求大同的无政府，能举其实者，必为努力学问，过于今日德人之一人类也。此次先生对于为学问求学问的曲折，详晰诲示，弟唯有一读一心折。不唯我等毫荒不学的，受了宏益；尤其是此后英年国秀，有了南针。我国代表学者的孔子，便是一个政论家，带了功利的色彩不少。“《诵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亦奚以为？”在他虽然别有用意，然“学也禄在其中矣”，后之时王即用爵禄为激扬学问之具。自射策献赋，至固定而为八股制义，二千年久视学问为敲门砖。此种空

气，依然弥漫于今日海内外支那人校学侣之间。若复助之以功利学问之焰，其结果有如先生所谓冒牌出品等之种种，皆为必至之流弊。先生药之以详、示之诸说，诚苦海一航。先生齿及弟近来的誓词，以“无所为而为”见慰，自然非所敢任。先生诱掖之，俾有所慎重，甚为拜嘉。因此弟亦敢以双管不能齐下之苦衷，趁着机会，一加表白。弟既不学，所以偶有所涉笔，无非感受了许多外动，引出了一个盲目的反应。论起实在来，刚刚是有所为而为。先生乃奖励他是“无所为”，这怎敢不“不打自承”呢？我说，人的向前要求，同向后要求，与个人的身体，亦有一些儿比例。兄弟的身体，素来比较顽劣；因此，自觉向后的话，终值不得说。闭了眼睛想起来，凡喜欢说向后话的朋友，似乎十有六七，都是只有一个很贵弱的身体。这就是东方“病夫文化”的特点。年来我忽然觉得求生活了当的人，太多而且太认真。生活哪里来什么了当？了当便是向后要求；所以厌世同自杀的人，亦是不少。向后便到了一团；云一便是绝对；一则谁复从旁感其有无，自感亦复向谁说之，谓之为无亦可。既一团矣，无复云人；既已无人，复何有生。所以讲人生观的生活朋友，哪里配去管他。便是抱了宇宙观，亦且并无宇宙，连真如正觉，说得多少湛明，还是多事。倒不如用漆黑一团，记实方便称之。这种意思，还是我在认真生活上，算是给他一个易简生活的反应。这还是为着生活而动笔，与梁漱溟先生的动机一样；所以先生称他为“无所为”，是第一可愧。年来又觉得吾人对于生活，不是太认真，便是太不认真。不认真便是不肯向前。名为持中，亦是向后不了，姑且苟延残喘。因此，高等的持中，是乐天知命。中等的持中，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。下等的苟延残喘，受着乐天知命的暗示的，是一切命定，一切委托于鬼神，祈求再世的善生活承了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流弊的，是认定世界将要末日，逞些物质上的肉欲，似乎像唯有他落得了便宜。这坐于不晓得向后是一团，不甘愿一团，便成万有。万有又万有，止是向前，无中立的余地。斟酌尽善了，“自以为”改良复改良，乃赞成有人生观人的本分。这种意思，我又对于不认真生活的，算是给他一个生活要努力的反应。这全是淑世的肤浅话头，免不了好像做了托尔斯泰先生们门下的走卒。这赖不了有些功用的热望。先生乃奖他是“无所为”，是又一可愧。做了生活向前的梦，便想到整理万有，用一种最易简的工具，便是科